…大学清史研究所
资料室
6 9

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

郭松义

我在几年前，曾经写过一篇《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》①的文章，就清代人口大量流迁的社会背景，它的流向、意义，以及封建国家对流迁人户的政策，进行了某些考察。后来，我因翻阅宗谱资料，发现在很多宗谱中，都有关于家族成员外迁的记载，其中有的本身就是在清初或雍乾之际迁居新地后，因子孙繁衍而另立谱系的。宗谱资料尽管涉及的面一般较窄，但由于它载录具体，有的还可以得到有价值的统计数据，这就显得难能可贵了。通过对几部或几十部家谱的综合分析，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涉及面不宽的毛病。

下面，就我接触的几十部宗谱，对清代人口的迁徙问题，再作一些探讨，算做对《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》一文的续篇。

一

在正式讨论问题以前，先把有关宗谱中，可以作出统计的家族外迁成员数，进行列表：

家族名	总人数	外迁人数	所占比例	资料来源
湖南邵阳李氏 （11—20世）	6,829	833	13.24%	光绪《湖南邵邑李氏族谱》①
江苏常州陈氏 （第10世）	74	9	12.16%	光绪《昆陵陈氏宗谱》 （大房分际公支派支系）
湖南宁乡高氏 （19—16世）	118	12	10.16%	嘉庆《资阳高氏三修族谱》（华房铺公系）
浙江余姚徐氏 （16—17世）	538	35	6.5%	同治《孝义徐氏宗谱》 （偏房、承惠、承恩宅六系）②
湖南衡阳魏氏 （17—25世）	11,185	716	6.4%	民国《衡阳魏谱氏宗谱》①
安徽黟县朱氏 （17—21世）	618	33	5.33%	民国《屏山朱氏重修宗谱》（黟屏山派）
广州花县洪氏 （17世）	216	8	3.7%	民国《洪氏宗谱》③
四川邻水李氏 （6—9世）	341	12	3.51%	宣统《四川邻水李氏族谱》
四川巴县李氏 （26—30世）	1233	41	3.32%	民国《陇西李氏续修族谱》
福建延陵吴氏 （13—14世）	133	3	2.25%	道光《延陵吴氏族谱》
山东即墨杨氏 （11—21世）	6,016	133	2.21%	光绪《即墨杨氏族谱》

①以上统计数字系根据刘翠溶：《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——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》（载（台）《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》，“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”1983年出版）所载数综合而成。又，以下所引有关湖南邵阳李氏和衡阳魏氏资料，亦均同此。

②另有情况不明者五十人未能统计。

③此本系经陈周棠校补，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以上共列了十一个家族的外迁资料，涉及的地区有湖南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四川、广东、福建、山东等八个省分。从家族的外迁人数来看，比例最大的是邵阳李氏，达到13.24%，还有象常州陈氏、宁乡高氏，都超过百分之十，最低的象即墨杨氏，也有2.21%。当然，限于资料本身的原因，或因在统计方面所存在的困难，上述数字，有的并不全面，但是作为一种抽样分析，基本上还是可以的。就在上述列表中，我们看到，在清代，各家族的人口外迁，不但数量不小，而且也十分频繁。

那么，是什么缘故造成家族成员不断外迁的呢？

根据宗谱记载，战争或者大的社会变动，往往迫使家族成员不断向外流迁。《桂林张氏族谱》中谈到：先世张仕冕，“原籍金陵应天府江宁县，明末被兵，奔逃远出，间关跋涉，靡有宁宇。国初抵粤西，见其山重水复，风俗淳朴，堪栖止，乃卜寓于西关之五里墟，出其余赀，置田庐，成家室，……是为入粤始祖。”②四川简阳游氏的迁移过程更有意思。游氏原籍就在简州（今简阳县），明朝末年，因“遭献贼之乱，避兵顺庆府之邻水县”，后又辗转迁至贵州。清初“乱定”后，游氏一家才又重返四川，并定居于开始避兵的邻水县，以“力耕为务”③。在1984年第1期《中国史研究》中，刊登了一篇《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》的文章，里面谈到顺治末年，清朝政府为阻止东南沿海居民与郑氏抗清力量的联系，曾下令“迁界”。一时间，很多人流离失所、无处归依，其中有的人就东渡台湾，甚至远徙国外，造成家族人口的大迁移。

光绪《凤市赵氏宗谱》中有这么一段记载：“四下儒桥天水一族，自道清公始迁以来，绳绳相继，椒衍繁盛。咸丰间，聚族而居不下千余人。无何时，丁不造劫，遭红羊虏亡殆尽，大小男妇，什不存一，综计之，仅一二十人。”④凤市赵氏居于浙江分水县，里面所谈情况，主要是反映清末太平天国起义中，战乱对该宗族所带来的浩劫。赵氏原有家族成员千余人，到后来只剩下“仅一二十人”。当然，这里包括有因战争而死亡的，也有的随太平军而远去，但其中确有相当部分，为逃避战乱而流亡它乡了。

由于战争等社会动乱而造成的人口流迁，并非清代才有。在历史上，比如两晋交替之间，或宋金之际，都是如此。比较起来，清代不算十分突出。

其实最能体现清代人口迁移特点的，还是康熙末到乾隆、嘉庆时，社会局面相对平稳期间所出现的，那种频繁的人口流迁。在上面的列表中，我们曾例举过衡阳魏氏。该家族从第十七至二十五的八代中，统共外迁七百一十六人，而迁移比例最高的是十九到二十一这三代，共迁出三百零九人，占整个外迁人数的43.15%。根据宗谱记载，这三代中，最早出生是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，最晚为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⑤。以此推算，该家族的外迁高潮当为雍正到嘉庆间，其间又以乾隆时期为最盛。与衡阳魏氏相类似的是宁乡高氏。根据我的初步统计，这个家族仅乾隆年间迁往四川等外省的，就不下百余人⑥。另外，象山东潍县陈氏家族，在他们的外迁人口中，乾嘉年间亦是属于盛期。

从这些家族的迁移的流向来看，大体湖南、广东、福建等省的居民多迁往四川、湖北西部、陕西南部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等地，当然也有不少是在本省范围迁徙的。宁乡高氏的一百一十一个外迁人户中，移居四川的是七十九人，占71%，湖北十六人，占14.4%，陕西七人，占6.3%，广西四人，占3.6%，另有五人迁居地点不明。

邵阳李氏和衡阳魏氏两家族，有迁居地点可查的，一是四百十三人，一是五百五十八人，具体地点为：

家族名＼迁居地	湖　南	陕　西	湖　北	四　川	广　西	云　南	贵　州	江　西	其　它	共　计
邵阳李氏	83（20.1%）	143（34.62%）	88（21.3%）	77（18.64%）	7（1.7%）	2（0.84%）	13（3.14%）	9（1.6%）		413
衡阳魏氏	136（24.37%）	95（17.06%）	111（20%）	115（20.6%）	37（6.63%）	26（4.66%）	12（2.15%）		17（3.05%）	558

根据邵阳李氏和衡阳魏氏的人口迁居情况来看，最多的还是在湖南本省境内，其次是陕西、湖北、四川，广西、云南、贵州等就更要少些。

其它还有一些宗谱，由于缺载外迁地点，或所记不全，不能作表统计，但是通过一些片断记载，还是可以有所发现的。《汉阳朱氏家乘》："吾家先世江右南康府星子县鹿洞宋村，明季之难，荣野公始由故籍宦游河南，再迁湖北应城、汉川、天门等县，后乃占籍汉阳，居汉口。四世一经公往蜀中先后无消息；六世兴哲公迁湖南益阳，至今四五传矣。"⑦又如：湘潭谭氏："（谭）恩德，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九月十七日辰时生，往西蜀。"⑧广东长乐郭氏："义清，康熙十四年生，徙粤东乳源县住，雍正九年殁"；"义汪，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徙居四川顺庆府南充县"；"显仕，乾隆元年九月十九日午时生，往广西"。等等。以上记载，虽然十分零碎，但从他们的迁居趋向来看，基本上可以与宁乡高氏、邵阳李氏、衡阳魏氏等家族的流迁情况，相互印证起来。

直隶、山东、山西等北方省区的家族，通常多流向东北关外和口外蒙古地区。辽阳吴氏的先世原为山西太原府瓦房村人，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，"迁至奉天省辽阳城高丽门里，始隶旗籍，占地五十余亩，再迁辽阳城北五十里孟胡屯，选村之原，服田力穑，经营家室，遂聚族居之"⑨。在"孔村府档案"的"宗族"类中，保留了一部分清代中后期孔姓族人为请求续谱、向孔府大宗主呈递的禀帖，其中不少是在康熙年间从山东流迁到关外的。移居口外蒙古地区的记载也不少。山东潍县的《陈氏族谱》中，专门编有"寄籍图"。根据我从"寄籍图"的统计，在十二至十七代间，共外迁一百零三人，具体的去处是：

口外蒙古地区	51人	占49.5%
东北关外地区	18人	占17.48%
京师	8人	占7.77%
情况不明者	26人	占25.24%

另外象《交河李氏族谱》等宗谱中，也有关于迁居口外蒙古的记载。

江苏（主要是苏南）、浙江一些家族成员的外迁，一般都距离较近，而且往往迁往城市。浙江上虞何氏"粮房德盛之崇十派"，第十二至十六世的六个外迁人户中，有五人是迁居杭州省城的⑩。《孝义徐氏宗谱》系浙江余姚徐氏家族所修，在他们的外迁人口中，也载有迁居杭州的。

在广东花县《洪氏宗谱》第十七世中，有八人流迁外洋。这里所说外洋，当系今东南亚地区，这也是清代闽广贫民外徙的一个重要去所。

二

上述各家族成员的外迁，除了象湘、粤、闽、广等地人户多流向川、陕、桂、滇、黔等省，直隶、山东、山西多迁往关东、口外，那种大范围的地区特点以外，还有一些情况也颇值得注意。

（一）、由于封建国家对流迁人户所采取的政策不同，反映在家族成员外迁时，也具有不同形式。大体说来，在康乾之际迁往川、陕、楚、桂等地的人户，一般多是妻儿老小举家远徙。这在四川可谓最典型的了。四川省自明末以来，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，人逃地荒，很多地区，都是“草蓬蓬然，植立弥山谷，往往绵亘百数十里无人烟”。⑪清朝政府为了鼓励原籍外迁者或客籍人户前往复业开垦，于康熙、雍正时特别颁布了招垦条例，实行种种优待，从而吸引了两湖以及闽粤等大批农民进川开垦，这在当时叫做“插业”或“占垦”。“占垦者至，则各就所欲地，结其草之口，广袤一周为此疆彼界之别，占已牒于官，官不问其地方数十里、百里，署券而已，后至者则就前者贸焉，官则视值之多寡以为差，就其契税之”⑫。正是在这样条件下，迁居者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，往往都是整个家庭，或者与至亲密戚结伴而行。《蜀西崇阳王氏族谱》记载了“明献忠之乱后”，王氏祖先从湖北麻城县迁居四川崇庆州“插业”的经过。同行的除兄弟二人外，还有舅父梁九成、表弟梁应高等数人。绵西张氏原籍广东惠州府龙川县人，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迁蜀，带头的是其母巫氏，跟随巫氏的有其儿孙十余人⑬。从广东嘉应州龙川县迁入四川的陇西李氏，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远徙时，包括妻儿兄嫂等等，多达一十三口⑭。

至于迁居鄂西、陕南、湘西等地的人户，虽然没有象康乾之际招民入川时那种优待条例，但因清朝政府并不过多进行干预，再加上这些地区，毕竟地旷人稀，生活相对较比容易，所以也常常合家同迁。嘉庆《资阳高氏三修族谱》中，保留有这样一些记载：⑮

第十二代：学诗，康熙六十年生，乾隆三十五年殁，葬湖北房县载家榜奉形山。学诗之后俱往湖北房县。

第十三代：安桂，进川。随行者有妻邓氏，子邦沈、邦炳、邦隆、邦琰、邦瑈。

第十四代：邦拔，往蜀。妻蔡氏，长子国助、次子国取，国取妻易氏同行。

第十六代，光理、光世、光宗、光族、光励、光烈兄弟六人迁往陕西。

迁往关外和口外蒙古地区的人户，情况就不同了。他们通常均单个外徙，最多的只是兄弟同行，或本人携子迁往，很少看到携带妻女，举家迁居的（这在清朝后期有所变化）。之所以如此，亦与清朝政府政策有关。自康熙中期后，清廷为保护关外“龙兴之地”，或因限制蒙汉接触，对出关出口的人员，实行隔离和限制，特别对于妇女，禁止更厉。这也是在很长时期里，出关、出口者多以青壮男子为主的重要原因。

（二）由于上述外迁人户，动辄数百里，甚至千里以上，而等待他们的新处所，又多是成片的荒山弃田，这对于初来乍到的贫苦农民来说，存在着很多的难关。为了使相互有所照应，在迁居者中，往往形成一种滚雪球似的牵连关系。宁乡高氏迁往湖北的家族成员，凡注明有州县名的，差不多都集中于利川、房县、咸丰、竹溪四个县，入川者多定居于东部的梁山（今梁平县）、彭水等县。云阳涂氏的祖先弘亮，所以于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由湖北蒲圻县携子入川，就是因为在此之前，他叔父一家已在那里稍有基础，可以有所依藉⑯。郴州房氏第二十世的十一名外迁者中，去云南的有四名。其中三名落业于矿厂⑰。民国初年，四川

简阳游氏为修造宗谱，曾对附近各州县的游姓家族作了一次调查，发现很大一批人的原籍都是福建的。他们集中居住在成都附近的新繁、什邡、彭县、中江、大邑等县。这些游姓聚居区，均属清初迁居时，为了互相照应方便而形成的⑱。山东潍县陈氏家族成员外迁，几乎将近一半都定居于口外，而且一代连着一代。

（三）由于情况的改变，各家族的外迁地点，在前后的不同时期，往往会有所变化。通过这些变化，可以看到清代人口流迁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。且仍以宁乡高氏为例：根据宗谱所载迁出人口生卒年月的推测，大致康熙中后期到乾隆期间，移居四川的人数占有绝对的优势，乾隆中后期至嘉庆、道光年间，他们就逐渐转向于湖北、陕西、广西等省。为什么会有此变化？原来四川省当康熙至乾隆前中期，在清朝政府的大力鼓励下，曾经迁入了大量的外省客民，但到乾隆中期以后，在容纳移民上，开始出现某种饱和状态，也就是说，没有更多的闲旷土地可供迁居者开垦了。于是，转向陕南、鄂西、湘西、桂、黔等老林山区，便成了移民者新的追逐目标了。宁乡高氏的记载，正反映了这样的一种事实。

在其它一些资料中，也是如此。郴州房氏第十九、二十两代，正相当于乾隆后期到嘉庆、道光之间，他们的外迁者中，有一半以上是到云南、广西的，其次是湖北、广东，约占百分之三十，再也没有看到有人移居四川。其实就在先前移居四川的一些家族中，后来也开始有人外迁。陇西李氏是雍正初年入川的，根据原先的辈分是第二十四代，到第二十六代，也是乾隆后期到嘉庆间，就有五人远徙，二十七代为二十三人，二十八代四人，二十九代七人，等等⑲。陇西李氏的“远徙”，没有说明具体地点。但从《邻水李氏族谱》中的某些片断记载来看，这些远徙者多数是移居陕南、贵州、云南等省的，当然也不排斥再向四川边缘山区迁移的可能。

从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，移居到人口相对比较稀少的地区，然后又不断地向另外一些人口稀少区扩展，这样的一种迁移动向，反映了清代自乾隆以后因人口激增所产生的种种矛盾，以及人们为减轻压力所作的某种自发的调节行动。

三

最后说一下，上述外迁的家族成员，在移居新地后所从事的劳动。

根据宗谱所载，绝大部分人还是从事以耕垦为生的农业劳动，这从他们的迁移动向中，亦简接地说明了这个问题。下面我们列举迁入四川的几个家庭作为实例，比较具体地考察一下迁居者的情况。

一、崇阳王氏：“先世有讳应学者，由湖北麻城孝感乡徙居四川崇庆州，是为王氏始祖，……耕稼为业，称富有焉”。⑳

二、绵西张氏：“么讳良登，字美升，自粤随母携弟来川，肩负行李仅有二十余金，其初住川东，继而复迁返德阳，佃田为业，积累百余金，买旱地数十亩，后三股均分，……乃往绵竹，……耕种为业。”㉑

三、陇西李氏：“敏葵公…生于粤省嘉应州长乐县……雍正四年饥，……启程迁蜀，…徙巴邑白市驿玉皇观徐家湾，……佃耕三载，（兄）汉公去，公耕一十九春，……转佃龙凤场任家坝。”㉒

四、云阳涂氏：“公讳弘亮，……湖北武昌府蒲圻县人，……食指繁地窄，岁获不足以赡事蓄，……公以乾隆二年携子开盛入四川，……至夔州云阳县，……独爱老龙坪山水之

胜，……购地一区。”其子开盛，“率三子披荆斩棘，辟良田数十顷”，家境得以小康㉓。

上面四个家庭，分别迁自广东、湖北，估计原来都是些中下等农户，象张良登一家十余口，全部家货不过二十余金。有的人所以要背井离乡的远徙，是因为家庭“食指繁地窄岁，不足以赡事蓄”；有的恰恰又遇到灾荒，生活更难过了。他们到抵新地后，希望的就是要得到土地，而当时能够得到的，也只有是待耕的土地。通过佃种耕垦，使生活较前有所改善，这就是崇阳王氏等四户农民的要求，也是当时千百万迁居者所追寻的目标。

类似四川的情况，在移居关外和口外蒙古地区的北方农民，也是一样的。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，孔姓族人孔昭荣向孔府呈文说：“至族六十二代祖闻金、闻魁，于康熙年间因家贫，赴奉天广宁教读行医，嗣后口迁居昌图厅于卓里克图旗彦丹泡地方垦种地亩，遂家焉。”㉔另外象海城县族人孔广芹，兴京（今新宾县）族人孔兴和等，也都是从康熙年间从山东迁往辽东，投靠王府，佃种旗地这样发展起来的㉕。

当然，上面谈的只不过几个例子，但作为当时迁徙者的活动趋向，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。

因外出经商而久居未归的，在宗谱中也时有可见。光绪《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》记载：“叶林，生于嘉庆二十二年，往粤西贸易未归，落业桂林”；“叶祀，生于嘉庆元年，往外贸易未归”；“叶翠，生于乾隆十九年，往连州贸易”；“叶亭，生于乾隆四十八年，往贸易落业”，等等，都是因往外经商而迁居的例子。寄居于山西襄垣、黎城等县的一批孔姓族人，亦因其父祖前往“贸易”，而遂以为家的㉖。还有的人因为在外经商成了富翁，受到原家族的夸赞。广东长乐郭氏，有一个叫郭永连的人，因“思家道之丰豫在于人为，不可以守株也，乃迁居于衡府，合伴经营货殖”，不久“立业于衡永两处”，“有田百余亩”，成为一个财主㉗。又如郭大隆，“始贫寒，随兄偕弟寄迹楚粤绍胶，鬲之鱼盐，法端木之殖”，“遂致田园日广，栋宇日新”㉘。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徽黟县《汪氏大宗历朝续录》中谈到的。“黟俗尚贸易，凡无赀者多贷于大户家，以为事蓄计”。很多汪姓族人就这样借着资本，纷纷外出从事贸易，有的因此立业于外省府县。

在我翻阅的宗谱中，还发现有进山开矿的。上引《房氏宗谱》，便有“往云南厂落籍”，或“往云南厂未归”的记载。乾嘉之际，云南、贵州等省的矿厂很盛，很多外省贫苦农民纷纷前往投靠，聚集开矿，《房氏宗谱》所云，即系当时情况的反映。

当然，不管是经商，或是进山开矿，在整个外迁中毕竟属于少数，更多的人还是象前说到的，从事于农业劳动，这也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互相吻合的。

---

①见《清史论丛》第五辑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。

②民国《桂林张氏族谱》卷一，《世谱》。

③民国《简阳游氏谱》卷十六，《事略》。

④光绪《凤市赵氏宗谱》卷二，《世表引》。

⑤转见刘翠溶文。

⑥嘉庆《资阳高氏三修族谱》卷一至卷八。

⑦光绪《汉阳朱家家乘》，《记事》，《序》。

⑧民国《中湘谭氏续修族谱》卷三，《下齿录》。

⑨民国《辽阳吴氏族谱》卷一，《世居考》。

⑩道光《崇里何氏宗谱》卷十五，《粮房世系图》。

略论康熙平定布尔尼叛乱

袁森坡

一

1675年（康熙十四年），清朝在紧张地筹划平定三藩叛乱的斗争中，内蒙古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发动了反清叛乱，严重地威胁了北京和东北、内蒙的安全，叛乱的规模虽然较小，而且很快被玄烨（康熙帝）镇压下去，但这次事变的前因、后果、影响等问题，还有必要予以探讨分析。

布尔尼是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代裔孙林丹汗的孙子。明朝末年，林丹汗曾一度称霸漠南，企图以武力统一蒙古，并与明朝结盟，在辽东与后金抗衡角逐。后金汗皇太极为了奠定全国的统一大业，曾四次亲征察哈尔，迫使林丹汗向青海逃亡，中途病死于甘肃大草滩。①其长子额哲、次子阿布奈都归降了后金。1636年（天聪十年）正月，皇太极将次女马喀塔下嫁给额哲，旋封额哲为和硕亲王，在义州东街为他建立了和硕亲王府，又将察哈尔编为八旗，安置于义州附近。1641年（崇德六年）额哲病死，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十月，寡居的公主遵旨再嫁给阿布奈，生有二子，即布尔尼，罗布藏。1648年（顺治五年），阿布奈袭和硕亲王爵。1663年（康熙二年）二月，公主去世②，清朝不时派人看望布尔尼兄弟二人。布尔尼长大以后，娶皇太极之兄阿巴泰的孙女，安亲王岳乐之女为妻，爵秩为郡主。

清朝对林丹汗的苗裔优渥备至，处理上是妥当的。当然，这也是由于清朝为了统治全国、必须扩大统治基础这个历史条件所决定的。但是阿布奈却心怀叵测，强烈不满。这是因为，从成吉思汗到林丹汗一系的汗统，共传了二十二代，四百二十八年(1206年至1634年)，当年黄金氏族叱咤风云的历史，主宰大漠命运的声势，时时都在鼓荡着阿布奈的心胸，使他梦想着再倒转历史的车轮，打破清朝的统一局面，在蒙古草原独树一帜，再与清朝角逐。福临去世

⑪⑫⑯民国《云阳涂氏族谱》卷十九，《家传》，涂凤书：《功亮公传》。
⑬民国《绵西张氏族谱》卷二，《记文》，《德邑巫太君专祠修建始末》。
⑭㉒民国《陇西李氏族谱》，《蜀川渝州官庄始祖敏葵公记》。
⑮嘉庆《资阳高氏三修族谱》卷一、四、五。
⑰光绪《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》卷之六。
⑱民国《简阳游氏谱》卷末、《附识》。
⑲民国《陇西李氏族谱》卷二。
⑳民国《蜀西崇阳王氏族谱》卷十二，《艺文志》上，濬章：《清封通奉大夫高祖考永龙公家传》。
㉑民国《绵西张氏族谱》卷二、《记文》，《美公行述》。
㉓民国《云阳涂氏族谱》卷十九，《家传》，涂凤书：《功亮公传》，《怀安公传》。
㉔曲阜文管会藏："孔府档案"，编号：0924之3。
㉕"孔府档案"，编号：0422之15，0925。
㉖"孔府档案"，编号：1201之2至4。
㉗光绪《长乐郭氏六修族谱》世集，邓松：《郭君德秀公墓志铭》。
㉘光绪《长乐郭氏六修族谱》世集，《铣房墓志》，《德舆公墓志铭》。